



经典作家之 蒋光慈

蒋光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白塔畈(过去属霍邱县),早在1921年春,他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他一面汲取马列主义真理,一面进行文艺创作。

蒋光慈最早重视革命文学的理论建设,他是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之一。1924年8月1日,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发表论文《无产阶级革命

与文化》,以及后来写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文中,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初步论述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文学的阶级性诸理论问题。1928年后,蒋光慈结合当时革命文学问题的讨论,写了《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论文,连同他写的《太阳月刊》前言与编后记等,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系统地、较为深刻地阐明了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他已经看到,光暴露“黑暗”,抉剔“罪恶”是不够的,还要“认识现代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蒋光慈阐发革命与文学的不可分割性,把摧毁旧世界与创造新生活作为文学的历史使命并提,无疑在当时起到了提高人民信心、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他还号召作家深入生活,深入革命实际,“要求他们认识时代,了解时代的社会生活,要求他们与革命的势力接近”。他更希望作家坚定革命的立场和信仰。他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没有对于革命的信心,没有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是写不出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蒋光慈提出了评判作家革命与否的标准:“倘若我们要断定某个作家及其作品是不是革命的,那我们首先就要问他站在什么地方上说话,为着谁个说话。这个作家是不是有反抗旧势力的精神?是不是被压迫的群众作出发点?是不是全心全意地渴望着劳动阶级的解放?……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作家就是革命的作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如果说,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的见解与理论,在过去影响了无数作家走上为革命而写作的道路,那么对于今天革命观念有些减弱的文艺工作者,蒋光慈的话,仍会像洪钟大吕一样

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蒋光慈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而且是力行者。在文学创作上,蒋光慈的贡献是诗歌和小说。他说:“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他先后呈献给读者《新梦》《哀中国》《战鼓集》和《乡情集》等几本诗集。

《新梦》是以讴歌社会主义给中国新诗坛带来耀眼光辉的。“贝加尔湖的清水/把我的心灵洗净了;乌拉山的高峰,/把我的眼界放宽了;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诗人以清亮鲜活的嗓音高唱着热爱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真理的情怀: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伟大的列宁;同时怀念正处于黑暗深渊中的祖国和人民,并召唤祖国劳苦大众起来斗争,“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哀中国》和《战鼓集》写于1924年至1926年,是在作者从苏联回国后,目击中国黑暗的现实发出的悲愤呼喊。激越的慷慨、庄严的召唤和深沉的悲叹交织在一起。而《乡情集》则是表达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转入新的革命历程后的思想和经历,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也是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

钱杏邨在1928年写的《蒋光慈与革命文学》一文中,曾说蒋的诗“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在中国新诗史上,郭沫若以《女神》唱出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而蒋光慈鲜明讴歌无产阶级革命的诗篇,为中国的政治抒情诗开辟了一大领域。

蒋光慈后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中篇《少年漂泊者》和《鸭绿江上》等8部短篇小说,以揭露和批判旧社会的黑暗现实为主。《少年漂泊者》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裁,较便于倾诉

人物的苦痛和感慨;真切地展示了主人公汪中在旧社会萍漂移,最后走上反抗斗争道路的过程。这部书一出世,便激荡了许多青年的心,不少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蒋光慈及时写出了《短裤党》这篇纪实小说,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作者自叙《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在作品里,工人阶级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阶级搏斗的激烈气氛都被作者充分地渲染了出来。大革命失败后,蒋光慈写了《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直到1929年写的中篇《冲出云雾的月亮》,这些作品有着作者苦闷失落情绪的印记,也反映了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这时候形成的小说作品中“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是革命文学从幼稚到成熟不可避免的中间环节,蒋光慈充当了这一“过渡”型的代表。在历史的检验中,我们会发现他的不足与缺点,但是其作品中那情境的创新与热情的倾注,无疑是对革命小说的一个贡献。

今天纪念蒋光慈,我们怀着亲切的感情读他最后一部巨作《咆哮了的土地》(出版时名《田野的风》),这部作品是以蒋的家乡为背景写党所领导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以及最后向井冈山的进军。其中李杰、张进德等形象,写得真切生动。现代文学史家公认是蒋光慈最好的接近于成熟的作品,也是革命小说派的代表作。“革命小说在20年代后期,曾经风靡一时,那时的知识青年中出现过‘蒋光慈热’。”

蒋光慈的生涯很短暂,他只活了30岁,但他的文学贡献很大。我们缅怀他,纪念他,以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去奋斗!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少年漂泊者》在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影响

□江 琼

革命作家蒋光慈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最早被中国共产党秘密派往苏联“取经”的先行者之一。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当是无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战斗武器,应当是“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因而在革命的队伍中蒋光慈拿起了文学的武器,利用文学作品倡导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任何价值判断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革命的联姻是历史与现实情境的必然选择。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少年漂泊者》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主要叙述16岁的皖西乡村少年汪中,父母被地主迫害死亡成了孤儿。在流浪生涯中,当过学徒、奴仆、乞丐、茶房、工人、囚徒等,最终选择加入黄埔军校,在革命的炮火中壮烈牺牲。作为蒋光慈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中国“革命小说”的发轫之作,《少年漂泊者》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新篇章。

首先,小说完成于1925年11月,及时而深刻地展现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斗争。自这篇小说始,中国文学出现了“革命”这一崭新的元素。蒋光慈曾提出:“谁个能够将现实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少年漂泊者》则完满地体现了蒋光慈的这种认识。作者描写汪中由孤儿、奴仆、乞丐、工人、工会工作者以至最后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的漂泊历程,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黑暗社会。同时还描写了“五四”运动、“二七”惨案和“五卅”运动等声势浩大的场面。汪中在攻打惠州城的时候,在枪林弹雨中毫无惧色,高喊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壮烈地牺牲,预示了中国人民所蕴藏着的伟大力量必将释放、爆发。因此,这一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创性作品,被郭沫若誉为“革命文学的萌芽”。

其次,作品采用“五四”时期不多见的书信体小说结构形式,以孤儿汪中致诗人维嘉的一封长信,描写汪中近10年的漂泊历程和内心的不满与追求。《少年漂泊者》4万多字,由题诗、自序、十八节主体内容以及维嘉的附语四部分组成。小说开篇用《新梦》集中《怀拜伦》一诗作题诗,读者很快被一种高昂、奔放的情绪所感染。自序说明作者创作目的:对漂泊少年的悲惨命运,发出了愤怒不平的“粗暴的叫喊”;对那个吃人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深恶痛绝的“粗暴的叫喊”。故事情节的展开、环境心理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一封长信即十八节主体内容来实现。在维嘉的附语中作者转换叙述者,叙述声音由写信人汪中转到收信人维嘉身上,维嘉对作品中书信的来龙去脉进行补充,这样的叙事安排极大地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性,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构思上的匠心独运,也使作品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少年漂泊者》与郭沫若的《落叶》、冰心的《遗书》、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共同对五四书信体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再次,人物形象鲜明。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汪中是众多受苦受难的农家孩子的典型。他在父母被地主残杀、迫害而死之后,被迫过上了漂泊的生活:他做过川馆先生的“随从”,受尽了狎戏与污辱;做过沿街乞讨的“乞儿”,受尽了饥饿和痛打;做过杂货店的“学徒”,受尽了资本家的

蒋光慈的文学贡献

□方 铭

子,所谓凌弱欺贱的现象,大约是一定不会有的。”蒋光慈对这座皖西乡村乱坟山的描写,实际上写出了旧中国乡村的贵贱分明、凌弱欺贱,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作者通过描写孤儿汪中由乡村而城市,写地主、商人、军阀,写黑暗、残酷、卑鄙,最终写汪中反抗意识觉醒并投身革命,点燃人民埋藏在心底的革命火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少年漂泊者》鼓舞了广大读者的革命情绪,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其社会意义非比寻常。

文学作品除了艺术价值、审美价值,还应注意其社会价值、教育价值,《少年漂泊者》具有文学对社会影响的突出价值。汪中形象鼓舞、激励了许多生活在黑暗牢笼中的苦恼苦闷彷徨的青年,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中,给他们指出光明的理想前途,其历史功能凸显。

胡耀邦在学生时代,读了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便想“书里的人晓得漂泊,我为什么不可以革命!”于是,胡耀邦便毅然离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见《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陶铸直接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漂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参见《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金寨革命博物馆,当馆员介绍蒋光慈时说,胡耀邦、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读过他的《少年漂泊者》,这时总书记插话说,当年他的父亲也是受《少年漂泊者》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上卷》中,详细记载了习仲勋当年阅读《少年漂泊者》的情景。

少年习仲勋在前程茫然中,打开《少年漂泊者》,便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他感到主人公的际遇和自己的经历是何等惊人地相似,思想感悟与书中主人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习仲勋读着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情实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革命的决心。”“习仲勋从党正学惨遭杀害的事件中,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的反动本质。《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跃在他的脑际。他决心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正是受《少年漂泊者》的影响,习仲勋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父亲的多次回忆给习近平总书记留下深刻印象,他对蒋光慈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外,左翼戏剧家陈荒煤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写的《伟大的历程和片断的回忆》回忆少年时代读此书时的情景说:“堕入‘无声的中国’,真是说不出的迷茫和郁闷!……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使我感动得落下泪来。……文学确实成了我向往一个光明前途的灯火”。老作家田寿曾说:“《少年漂泊者》给我的印象最深,在青年时代我也追慕着漂泊生活,对当时现实不满!”以胡耀邦、习仲勋、陶铸为代表的一代青年,都是在读了《少年漂泊者》之后走上革命的征程。可见,《少年漂泊者》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何其广泛!意义何其非凡!

时至今日,《少年漂泊者》仍然具有无限魅力,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时代教育价值。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短篇小说《都霞》是中国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近90年前翻译的苏联短篇作品。这是蒋光慈翻译过的一篇重要作品,体现了他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感悟和审美情趣,也影响了他本人的创作。可是这篇作品自1929年3月在《新流月报》发表并收入蒋光慈著小说集《冬天的春笑》后,到现在各种蒋光慈文集和译著选本都没有选载。近乎是一篇佚文了。对于这篇作品在蒋光慈探索革命文学艺术性中的作用,研究的也不多。

蒋光慈在从事创作的同时,还进行翻译工作。蒋光慈还在莫斯科留学时就开始从俄文译介诗歌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新文学进入20世纪30年代,翻译更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以鲁迅、蒋光慈、夏衍、钱杏邨、叶以群为代表的“左联”成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倡导、译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中坚力量。蒋光慈在1927年与瞿秋白(化名屈维它)共同写作了《俄罗斯文学》一书,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题为《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下卷题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在作品翻译方面,蒋光慈选择的作家主要是富于革命色彩和阶级意识的作品。翻译了索波里《寨主》,爱莲堡《冬天的春笑》,谢林娜《信》,谢廖也夫《都霞》,里别丁斯基《一周间》,曹斯前珂《最后的老爷》,弗尔曼诺夫《狱囚》,罗曼诺夫《技术的语言》《爱的分野》等等,还有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理论单篇作品,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影响了中国文坛及他个人的创作。

短篇小说《都霞》出场的只有四个人物,就是赤军军官华西里、白军军官、贵族少女都霞、白军军官太太。特别是作者为赤白两位军官所设置的不同形象、行事风格及道德品质对都霞的影响,让一个女贵族最后同情革命,想变成一个“大写”的人,“新的感觉包围了她”,“自己感觉崇高”、挺身隐瞒华西里的下落,反抗白军军官的探问,这绝非随意铺排,而是别具匠心。蒋光慈在刊载《都霞》第一期《新流月报》的编后认为:“《都霞》白色圈中所悟到的党人的崇高,比在‘红’的环境中觉悟的更有价值”,“这种从侧面表现的方法感动人的地方,比从正面写来得深刻”。在《爱的分野》译者小序里,蒋光慈说:“本书……主旨是在于描写新旧恋爱观的冲突。这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可比,它实在有伟大的意义,我们由此不但了解革命后的男女关系,而且了解革命的趋向。”所以,蒋光慈坦承:“我的《丽莎的哀怨》,这一篇就是我的很大胆的尝试。”而《丽莎的哀怨》也因为这种大胆尝试,被认为是蒋光慈代表作之一。而蒋光慈在1926年9月创作的短篇小说《徐州旅馆之一夜》,也可看出受这篇作品影响的痕迹。

1929年秋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日记中提出如何“艺术地将某一期间之社会生活的主要的脉搏,根本的源泉,表现出来”即革命文学如何避免“政治宣传大纲”加“公式主义的结构或脸谱主义的人物”的弊端?蒋光慈首先注意到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9月15日,蒋光慈在太阳社东京支部会上组织批评《丽莎的哀怨》。在国内一些左翼作家对《丽莎的哀怨》批评指声中,冯宪章比较正确地评价了《丽莎的哀怨》的形式探索。冯宪章认为蒋光慈描写白俄贵族悲惨生活的反面表现手法,使小说形成散文诗的风格——这正是蒋光慈创作《丽莎的哀怨》的初衷。《丽莎的哀怨》以独特的叙事角度彻底冲决了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范式,给读者以惊异与新鲜。这种“反面表现方法”的采用,正是蒋光慈受苏联作家谢廖也夫的小说《都霞》影响的结果。在这期的编后中,蒋光慈还引用钱杏邨的一篇随笔介绍《都霞》:“这种表现的手法,是万分值得从事普洛文学作家注意研究的。”由此可以想到我们自己试作的一些‘抱着柱子固定的转’的笨拙的表现法可笑……”《丽莎的哀怨》就是蒋光慈借鉴《都霞》打破“抱着柱子固定转”的一次“很大胆的尝试”。《丽莎的哀怨》和蒋光慈所有的作品一样,成为畅销书,并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禁。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省经济管理学院)

谈蒋光慈的早年译著苏联短篇小说《都霞》

□胡金凤